

佛教文化丛书

宋代禅宗文化

魏道儒 著



5.5

出版社

佛教文化丛书

宋代禅宗文化

任繼愈署簽



魏道儒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宋代禅宗文化
魏道儒 著

责任编辑 赵智海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鹤壁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 插页 8 印张 184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3000 册

ISBN 7-5348-0840-5/K · 269 定价：5.80 元

序

魏道儒同志在把他的博士论文《宋代禅宗史论》送交出版社之前，希望我写篇序言。本想写一篇关于禅宗的专题论文作为代序置于书前，但因为身边要做的事情太多，力不从心，这个念头只好作罢。近年在读书、研究和讲课中对禅宗产生一些想法，不妨借此机会简要地写出来，就权作此书的序言吧。

(一) 禅宗成立的年代。中国古代禅宗史书把印度僧菩提达摩奉为禅宗初祖，虽对他来华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但以他在北魏之时到达嵩洛一带作为中国禅宗之始是不成问题的。近代以来学者们因看到关于菩提达摩的史传中杂有很多神话色彩，且在南北朝时代不可能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又鉴于唐末以后慧能的南宗已成为禅宗主流，所谓“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柳宗元《大鉴禅师碑》），因此强调慧能是中国禅宗“实际创始人”。在我过去写的文章中也曾这样说过。近年来读了不少从敦煌文书中发现的禅籍和中日学者的研究著作，对早期禅宗和北宗有了更多了解，认为把慧能说成是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不尽妥当，会为论述中国禅宗早期历史带来困难。第一、道信、弘忍之时以黄梅双峰山（破头山或破额山）、冯茂山（东山）为传法中心，已形成影响全国的巨大教团。据《唐高僧传》记载，道信时门下有弟子500余人，弘忍时有弟子上千人（据各

本《六祖坛经》），或云“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传法宝纪》）。这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到弘忍时东山的禅僧增多是个事实。当时弘忍的门下称“东山法门”，远近闻名。弘忍死前自称有十大弟子，其中有神秀、智诜、法如、慧安（老安）、慧能等人。武周时神秀奉诏入京，武则天问：“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答曰：“稟蕲州东山法门。”武则天说：“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楞伽师资记》）可见东山法门影响之大。道信生前所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弘忍所述《修心要论》，皆述禅法。如说慧能时才实际形成禅宗，对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便不好解释。第二，慧能南宗开始仅在南方极小地域流行，由于神会的活动，到“安史之乱”（755—763年）后才在广大范围内流行。《景德传灯录》卷十七《曹山本寂传》所谓：“唐咸通（860—874年）初，禅宗兴盛”，说的是南宗。实际上以神秀、普寂为代表的北宗曾长期在以长安、洛阳二京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流行。唐张说《大通禅师碑》说：“东山之法，尽在秀矣”，“推为两京法主，三帝（按指武则天与中宗、睿宗）国师”。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之下说普寂也是“二京法主，三帝门师”（按，此三帝是指中宗、睿宗、玄宗），“朝臣归崇，敕使监卫”；又说“北宗门下，势力连天”。因此，若说禅宗至慧能时才实际创立，也不好解释南北二宗分裂及北宗曾盛行于北方的史实。如果说禅宗从整体上是创立于道信、弘忍之时，至弘忍死后禅宗分裂为南北二宗，至唐末北宗衰微，南宗独盛于天下，是符合禅宗发展的历史的。

（二）禅宗的祖统说。在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中，天台宗和禅宗都编制了自己的比较严格的传法世系，上承印度释迦教主及其弟子，下接东土创教祖师。这种传法世系，实际是受了中国封

建社会的宗法制度的影响而创立起来的。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摩诃止观》卷一据《付法藏因缘传》提出二十四祖传承世系，又以西土（印度）第十三祖龙树为东土初祖，下接慧文、慧思，此后是智顗自己。如此代代由嫡系子孙相承。禅宗也有自己的传法世系，不过它的完成经历了很长时间。这里想指出的是，禅宗的祖统世系最早是由北宗提出的，南宗为对抗北宗才提出自己的祖统说，并大加发挥，最后编制出西土二十八祖，以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为东土初祖，慧能为六祖的传法世系。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的法如在唐永昌元年（689年）去世后，由他弟子或信徒立有《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之碑，其中提出了最早的禅宗付法相承的祖统说。碑文引东晋慧远的《禅经序》（按，此《禅经》是东晋佛陀跋陀罗译的《达摩多罗禅经》），认为印度的传法世系是佛传阿难，阿难传末田地，末田地传舍那婆斯，此后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授此法，“入魏传可，可传粲，粲传信，信传忍，忍传如。”此后，约成书于开元四年——开元二十年（716—731年）的《传法宝纪》（作者杜朏）继承了此说，又有所发展，说菩提达摩传慧（原作“惠”）可之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法如，法如及乎大通（神秀）”，并为他们分别立传。在开元二十年（731年）慧能的弟子神会在河南滑台与北宗僧人进行辩论时，曾批评了北宗利用为神秀立碑和写《传法宝纪》而擅自编造禅宗祖统说的做法，说：“今普寂禅师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修《法宝纪》，排七代数，不见著能禅师处。能禅师是得传授付嘱人，为人天师，盖国知闻，即不见著。如禅师是秀禅师同学，又非是传授付嘱人，不为人天师，天下不知闻，有何承稟，充为第六代？普寂禅师为秀和上竖碑铭，立秀和上为第六代。今修《法宝纪》，又立如禅师为第六代。未

审此二大德各立为第六代，谁是谁非，请普寂禅师仔细自思量看！”（《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实际上比《传法宝纪》略早成书的《楞伽师资记》也提出了东土禅宗传法世系。此书是神秀、慧安、玄𫖮三人的弟子净觉所撰，以《楞伽经》的译者宋朝求那跋陀罗为东土初祖，此后依次是菩提达摩——慧可——僧粲——道信——弘忍——神秀——普寂、敬贤、义福、惠福。神会可能没有见到此书，仅对《传法宝纪》等提出批评。神会认为慧能从弘忍处得授祖传袈裟，是真正的六祖，法如和神秀无此袈裟，不能称为六祖。他对弘忍以前的祖统没有提出异议，并据所称的《禅经序》（按，此非前述慧远之序，而是《达摩多罗禅经》卷一开头部分），提出十三代的祖统说，即西国八代：迦叶、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优婆崛、须婆蜜（当为婆须蜜）、僧伽罗叉、菩提达摩（原为达摩多罗，神会把二者混为一人）；又以菩提达摩为中土（称“唐国”）为初祖，下有慧可……慧能。此后的南宗，就是沿着这个路子，吸收《付法藏因缘传》及《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萨婆多部律学传承世系表，编制出西土二十八祖，东土六祖的传法世系的。日本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法藏馆1967年版）有关章节对此有详细考察，可以参考。

（三）《六祖坛经》诸本及其利用。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从收藏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唐写本《坛经》，校勘后收到《大正藏》中，此后又有铃木大拙等人校订的单行本流行。此皆称敦煌本《坛经》。以此为开端，引起学者重新研究《坛经》的兴趣，并多方搜求古本《坛经》。在日本发现了宋初慧昕改编本《坛经》有多种，其中有名的有兴圣寺本、大乘寺本、金山天宁寺本、真福寺本等等。中国自明代《大藏

经》收编元代宗宝改编本《坛经》后，其它古本《坛经》逐渐从社会中埋没无闻。社会上除流行宗宝本《坛经》外，还流行被称为“曹溪原本”的《坛经》，此实属宋代契嵩改编本系统。对于日本学者发现的敦煌本、惠昕本《坛经》，在中国学者中最先重视研究并利用的是胡适。1943年上海编印《普慧藏》时收入了日本铃木大拙所校的敦煌本和兴圣寺本《坛经》。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利用的人仍不多，在研究中经常被引用的仍是宗宝本《坛经》。1981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郭朋《坛经对勘》，将敦煌本、慧昕本（兴圣寺本）、曹溪原本、宗宝本四种本子分段对勘并加以评述。1983年他又以铃木所校敦煌本《坛经》为底本，参校以慧昕本、曹溪原本和宗宝本，撰写《坛经校释》，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二书所用敦煌本与惠昕本皆取自《普慧藏》刊本。此后，学术界更多地利用敦煌本进行研究，对宗宝本等反而很少利用了。我这里想说：第一、从不同《坛经》本子演变的事实，反映了禅宗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对此，中国学术界还研究得极为不够，今后不仅应从日本引进古本《坛经》中的惠昕本不同本子（大乘寺本、金山天宁寺本、真福寺本等），从朝鲜引进元德异本系统的诸本《坛经》，而且应加以对比研究，结合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说明。第二、禅宗思想虽随着时代有所发展，并且禅宗各派的禅法理论也有差异，但似乎仍可以说禅宗禅法思想的重要来源是《六祖坛经》，统一的禅法依据在《六祖坛经》。元代德异所谓“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坛经序》）；宗宝所说“此经非文字也，达磨单传直指之指也……今之禅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坛经跋》），是有道理的。因此，在研究禅宗的时候，应对已发现的诸本《坛经》作综合利用。在研究慧能及早期禅宗时固然应主要依据敦煌本《坛经》，

但在研究此后的禅宗史时，应在对比各本《坛经》的基础上，对《坛经》和其它禅宗文献作综合利用。

(四)中国禅宗具有很多鲜明的特色，如自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四句连称出现较晚)，强调自修自悟，“识心见性”，主张佛与众生没有根本差别，要信徒不要盲目崇拜佛和任何权威；说“定慧等”，重在内心自悟，寄坐禅于运水搬柴和吃饭穿衣的日常生活之中，用自由活泼的方式方法，针对不同的对象和场合，传禅说法，启悟参学者和门徒……。阅读《景德传灯录》等各种记言体禅宗史书和《碧岩录》等各种禅宗公案、禅语辑录，虽可以看到其中有不少故弄玄虚和“食人脓唾”(《云门录》卷上语)的记述，但确实有很多充满哲理和意味隽永的禅语，还可看见不少饶有生活情趣的禅门故事。那么，从佛学上说，禅宗的禅法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般若学说；二是涅槃佛性学说。禅宗从般若学说中吸收空观本体论和观察世界，构建禅法体系的方法论——二谛论和不二法门；从涅槃佛性学说中吸收人人皆可成佛的心性论，然后加以会通融合，构成自己的禅法理论体系。对此我有文章论述，这里不拟详说。

(五)在我国的佛教历史的研究中，从总体来看，研究宋代以前的较多，而对宋明及其以后的佛教研究较少。在对禅宗的研究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即对慧能南宗的早期历史研究较多，而对五代、宋及其以后的禅宗研究较少。当然，比较而言，对禅宗形成期历史和北宗，研究也少。近几年来情况虽稍有改变，但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实际上，禅宗在五代以后无论在禅法理论、传法方式乃至禅宗内部的组织形式和礼乐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如能对五代以后的禅宗文献进行系统的整

理与研究；对禅宗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综合研究，一定会大大丰富中国佛教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内容。

以上是我经常想到的几个问题，十分不成熟，借此机会写出来供专家和一切有兴趣者考虑。下面转换话头，谈谈这部《宋代禅宗史论》。

作者魏道儒原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从高扬同志学习印度佛教。此后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学系的博士研究生，专攻中国佛教史。《宋代禅宗史论》是他的博士论文。在论文答辩之后，他根据论文答辩委员会诸位学者的建议，此后又根据出版社责任编辑阅读后的详细修改意见，又作了两次修改和补充，特别是在通俗化方面尤为突出。

此书据大量禅宗资料，考察了禅宗在宋代的传播和发展，研究了“文字禅”的形成和代表人物、文字禅的各种表现形式。对宋代禅宗的两大流派——以宗果为代表的“看话禅”和以正觉为代表的“默照禅”，对契嵩的三教一致论，以禅宗的心性论为基础吸收儒家伦常名教思想的理论，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力图用现代通俗的语言加以论述。宋代禅宗为什么特别盛行？帝王、士大夫与禅宗的关系如何？什么叫“颂古”、“拈古”？“公案”与“话头”有什么关系？看话禅与默照禅有何区别、在社会上影响如何？对这些饶有趣味的问题，书中都作了介绍。书后所附部分禅宗文献摘编，可供有兴趣者方便参阅。本书是对宋代禅宗进行总体研究的初步尝试，是通俗系统介绍禅宗思想的第一本书，因是第一本，所以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在当前对宋代禅宗还没有充分开展研究的情况下，本书能写成这个样子，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相信此书对读者了解宋代禅宗思想文化会带

来不少方便，并可为进一步研究宋代禅宗提供某些借鉴。

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宋代禅宗研究著作问世。

杨曾文

1991年5月29日于北京

目录

序	杨曾文
一、绪论	(1)
二、宋代以前禅宗简论	(5)
(一) “东山法门”	(5)
(二) “南能北秀”	(12)
(三) 南岳系与青原系	(18)
(四) 禅宗五家	(24)
三、宋代社会与禅宗	(31)
(一) 宋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31)
(二) 宋代诸帝与禅宗	(34)
(三) 士大夫与禅宗	(42)
四、宋代禅宗发展诸阶段	(52)
(一) 佛教义学诸派的衰落	(52)
(二) 北宋前中期的禅宗	(57)
(三) 两宋之际的禅宗	(69)
五、文字禅的发展历程	(75)
(一) 善昭与公案代别	(76)
(二) “绕路说禅”——颂古	(85)
(三) 克勤及其《碧岩集》	(93)

六、宗杲的看话禅	(105)
(一) 宗杲的生平及其思想渊源	(105)
(二) “话头”与“活句”	(113)
(三) 看话头的心理体验	(123)
(四) “随缘放旷，任性逍遙”	(131)
七、正觉的默照禅	(136)
(一) 正觉的生平与重坐禅的传统	(137)
(二) 默照禅的空幻体验	(142)
(三) 宗杲对默照禅的批判	(152)
八、契嵩的儒释融合理论及其影响	(161)
(一) 契嵩所处的时代及其著作	(161)
(二) 契嵩的儒释融合理论	(167)
(三) 禅僧的道德修养	(182)
九、结论	(188)
附录一：主要参考资料摘编	(191)
附录二：宋代禅宗大事年表	(222)
附录三：宋代禅宗世系简表	(245)
附录四：主要参考书目	(237)
后记	(243)

一、绪论

禅宗兴起于初唐，盛行于两宋，是中国佛教长期发展和演变的必然结果。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辗转传入中国内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循着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并且不断接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基于不同时代的社会条件，佛教经历了从弱变强，再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禅宗的兴起和盛行，是与中国佛教这种发展的总趋势息息相关的。

从东汉到隋唐，尽管其间有过几次波折，佛教发展的总趋势却是从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步进入了它的鼎盛阶段。东汉三国时期，初到汉地的佛教主要依傍黄老道术而行，迎合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而发展。当时佛教刚刚开始在中国内地流传，它的一些个性特征和主要精神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业报轮回思想，阿弥陀佛和弥勒、观世音等佛、菩萨和净土信仰，已经广泛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雕造佛、菩萨像，建筑寺塔，开凿石窟，已经蔚成风气。尤其是富于思辨性的佛教哲学，以比较完整的独特面貌出现在中国的思想界。两晋佛教理论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般若学理论，佛玄合流，佛教依附玄学而获得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僧人围绕佛性问题展开讨

论，佛教逐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轨道。在这个阶段，佛经翻译事业有了充分发展，印度佛教的主要经典都已介绍到中国来，人们对印度佛教的整体面貌和主要精神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除了翻译的佛教经典之外，中土人士自己的著作也与日俱增。随着对佛教各种经律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学派也相继形成。两晋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建立，包括禅宗的兴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两汉之后的又一个政治大一统时代。国家的政治统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佛教也在此时进入了鼎盛阶段。南北朝以来长期的政治分裂，造成了佛教文化的地区差异，南方僧人重义理探讨，北方僧人重修持实践。统一王朝的建立，为佛教南北不同学风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佛教也开始出现了宗派。相继出现的有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以及密宗，是隋唐佛教的主要派别。各宗派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两晋南北朝以来佛学的成果，在思想上独树一帜，分别组织起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各宗派也都加强了自己的组织建设，并各立门户，逐渐形成了公认的传承系谱。各宗派都重视经济基地建设，以一地或数寺为据点，一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传教弘法或学术研究中心。佛教势力的强大，使它获得了与道教和儒教并驾齐趋的地位，出现了鼎足而立的局面。佛教已不是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外，而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哲学史上，隋唐佛学上承魏晋玄学，下启宋明理学，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为隋唐佛教诸派之一的禅宗，也同其它派别一样，是在继承魏晋南北朝佛教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两晋时期兴起和盛行的般若学和南北朝时期展开广泛讨论的佛性论，构成了禅宗赖

以建立和发展的两大理论支柱。禅宗与其它佛教派别相比较，无论在僧众的生活方式和修行方式方面，还是在对朝廷的基本政治态度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别。禅宗僧人一般远离闹市，垦荒开田，结茅安室，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解决衣食住问题。初期禅宗僧人大多文化素质低下，因此，不注重佛教经典而注重于禅僧实际情况的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由此禅宗表现出一种对传统佛教的叛逆精神。禅宗僧人在经济上有相当强的自立能力，并不象其它派别僧人那样，把朝廷的资助和社会的布施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可以采取与封建朝廷相对或不那么合作的态度，即处于形式上的游离状态。因此，他们也较少受政治风波的影响。禅宗所具备的这些特点，奠定了它的理论发展趋向现实的基础。就禅法思想的主导方面而言，禅宗强调自证自悟，自我解脱。它把一切外在的崇拜对象拉回自己的本心；它把成佛解脱等同于自我本性的显现；它把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个人问题的手段归结为自我的心理调节；它把一切修行实践概括为毫无执著之心而随缘任运的生活。因此，无论就其修行实践而言，还是就其理论核心而言，禅宗都与其它佛教派别有着明显的区别。

尽管如此，禅宗在唐代也仅仅是佛教诸派中的一派，它还没有获得压倒其它佛教派别的绝对优势，还没有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如果把观察禅宗的视野仅仅局限在唐代，那还不能充分认识它的价值，不能充分认识它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当佛教义学诸派趋于衰落的时候，当有些派别已经湮没无闻的时候，唯有禅宗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甚至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禅宗的价值，就在这种强烈的反差现象中格外引人注目地显示出来了。这种发人深思的反差现象，在唐末五

代初露端倪，在宋代就十分突出了，并且基本成为定局。因此，宋代禅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以往主要集中于隋唐及其隋唐以前，对宋代佛教的研究，特别是对宋代禅宗的研究，至今还没有充分展开。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宋代禅宗作一些探讨。限于个人的学识和精力，在短时期内难以对宋代禅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作为这一研究的开端，我们只能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宋代禅宗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和轮廓进行总体考察，并侧重对其中几个重要方面作比较详细的说明。